

余秋雨台湾演讲

余秋雨主讲《旅行与文学》



余秋雨 著

漓江出版社

余秋雨台灣演講

余秋雨主講《荷西與大學》



◎ 余秋雨
◎ 荷西與大學

基
本
演
講

余秋雨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玉容

封面设计：罗文松

责任校对：王 子

余秋雨台湾演讲

余秋雨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 - 1 号 541002)

新华书店发行

老年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 - 5047 - 3037 - 8 / I · 1266

定价：15.00 元



演讲中的余秋雨。

自序

直到编完这一书，我还是觉得，演讲是人世间的一件怪事。

在传媒发达的今天，那种披红挂绿、汗流浃背的竞选演讲和营销演讲在我看来已经太原始、太劳累了，更何况文化演讲。文化人要表达的话语，早已写在文章里了，何必再费口舌来弥补？文章写得好，读着可以放慢速度、来回咀嚼；文章写得不好，读着可以一目十行、匆匆翻过，这种自由在演讲现场便很难获得，听众只能傻傻地跟着演讲者亦步亦趋，而演讲者们似乎又有共同的约定，故意把关键性的内容含糊带过，只在陈词滥调间死缠硬



磨。那么，或许是想一睹演讲者的风度和口才吧，但抱歉的是，当代民众早已在电视前习惯了皓齿明眸、抑扬顿挫，能有几个文化人不使大家深深失望、摇头叹息？

站在讲台上的人也并非出于自愿。邀请者们认为你既然在课堂上讲过课，也就有能力进行社会性演讲，如果你自己也相信了这一点，等待你的只能是狼狈。第一，与课堂不同，你面对的不是一群确定的对象；第二，与课程不同，你讲述的不是一个非听不可的话题。即使是在大学里演讲，对各系学生来说也只是一项可去可不去的课余活动，并无任何约束。学生已经听了太多太多的课，怎么可能在好不容易留下的课余时间不运动不游戏不散步不休息，独独要到你这里来加一课呢？他们来，必然是来寻找课堂之外的特殊原因，演讲者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把演讲当作上课，一定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更麻烦的是，在大学里演讲，听的并不都是学生。一眼看去，前几排坐的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们甚至把夫人也带来了；再往后看，发现了好几位专业上的同行，他们对你已发表过的文章非常熟悉；边上，甚至还拥挤着一批外国留学生，他们的中文程度还十分勉强……面对着如此千差万别的听众，你居然要找一个题目讲文化，讲得大家当场不愤怒，过后不悔恨，真不知道从何处开口？

这还只是在说大学里的演讲。至于那种在报纸上发一个广告而张罗起来的社会性演讲，情况更要复杂得多。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进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你又要在其间假设出一个对大家都共通的必要性，其艰难是超乎想像之外的。邱吉尔抗击希特勒的社会性演讲之所以成立，因为国难当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社会性演讲之所以成立，因为人人都要投票；致富成功术的社会性演讲之所以成立，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个愿望……相比之下，文化演讲在普遍社会性上就很难成立了。因此，推上台去的



文化演讲者往往就像没头苍蝇，乱飞乱撞，企图找到一条生路。

有的人找的是学理性的道路。既然那么多人来，干脆来个下马威，用一些深奥的学理先把听众镇住再说。演讲一深奥，听众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更怕别人怀疑，结果谁也不好意思离开会场了。请看在多数外语演讲现场，笑声总是特别响亮，大家都需要用笑声告诉邻座，我听懂了。但是，这种奇特的效果毕竟不能持久，更不能重复，人们迟早总会知道，接受深奥学理的最佳场所是在书房而不是在演讲现场，而且作为现代公民也不必经常和深奥打交道。深奥带来陌生，陌生带来失控，失控带来不安全。大家都不喜欢不安全，因此也就不太喜欢深奥。

于是，有的文化演讲者就走向表演性的道路。他们审时度势，觉得面对不同的听众，演讲的技巧比内容重要，随之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幽默、嘲谑、反驳、排比、突转等等方法的调动上，把演讲当作了表演。表演性演讲与学理性演讲相比容易产生较为热烈的现场效果，因此趋附者渐渐多了起来。历年来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常常会把高分给予表演性较强的那些队，也就颇足玩味。记得前年我与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等一起担任评判，曾一再在电视直播中向各国辩论队指出，表演在辩论和演说中只是末技，我们切不可舍本求末。然而由于有效，表演性在演讲中的地位仍有大幅上升的可能。只担心这样下去，演讲的文化本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异。

这一切，都说明演讲所包含着的尴尬和危机。我本人每次外出旅游被人发现，终于被押送到演讲大厅的时候，总会在心底委屈地呼喊：我是来旅游的，为何要我承受这般苦刑？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心底里还是在默默为社会性的文化演讲祈祷，希望它能及早找到自己的立足方位。也许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良知们在街头高喊“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的声音使我着迷，也许是中国古代纵横家们的滔滔辩才使



我倾心，我总企盼未来的社会即便分割再细也能保留一些千人同心、声气回荡的空间，素昧平生的人们能以文明为话题而经常聚会，以一种巨大的合力保持住生存尊严。

大雅之会失之久矣，想重新招魂势必需要奉献一些牺牲赌。我被邀请作演讲实际上也就是被邀作牺牲，虽不无悲哀却很难推拒。被邀演讲总是时间匆促，完全来不及在心中细细构思；被邀演讲又总是在旅行途中，手头找不到任何准备资料；被邀演讲又总像被扔进一个不知深浅的大海，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在多少人面前、什么人面前丢人现眼。因此我总是头脑朦胧、脚步畏怯地走向一个个演讲大厅，终于在孤注一掷的狠心中强装出从容的微笑。

本书是我于 1996 年冬到 1997 年春在台湾各城市多次演讲的记录稿选集，顺便把 1992 年初次来台湾时的三篇讲稿也附在后面。

演讲一被记录，整理出来的文本常常会使演讲者大吃一惊。文字逻辑和语言逻辑的差别太大了，在演讲现场自认为讲得比较好的部位，一读记录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平淡无奇，词语简陋，拖沓噜嗦。我常常盯着这样的记录稿纳闷，问题肯定不是出在记录者身上，而是因为再好的记录也无法表述现场气氛和语言节奏，无法表述特定空间中的对应反馈关系，结果就像删去了对手和观众来看一场“单向”的球赛，怎么也不对劲。如果我在演讲中所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用文章来表达，那必然会用文字营造语境，渲染出一种自足的文本气韵，与演讲记录稿截然不同。过去常常疑惑，为什么那些充满有趣的人生经历又很会讲故事的老人写不好回忆录，而那些读起来很感人的文章一旦用口转述却索然无味，现在终于全然明白，在于文字语境和文本气氛。

面对着一大叠由不少年轻小姐、先生根据录音一字一句认真



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我犹豫长久。好几家报纸杂志考虑到未能前来听讲的朋友的需要希望发表，出版社也催着出版，而我则无法把文字语境和文本气氛加进去，所做的只是删节、归并、修补而已。因此，读着在阅读这本演讲集时应该抱着一种与阅读正式文章不同的心态，该原谅的原谅，该闭眼的地方就闭一闭眼，马虎过去算了。想想一个在过年过节的日子里独自背井离乡到一座座陌生的城市流浪，猝不及防地接受一个个陌生的讲题，又无法抵抗地去面对一群群陌生的听众，也是够可怜的，得宽容处且宽容吧。

既然在讲法上与正式文章不同，那么在内容上也必然不一样。社会性演讲的选集里如果夹杂了太多近似于学术论文的篇章，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好像故意要向社会大众显露一点什么。为此，我狠狠心刪掉了几位老朋友要我讲的专业性较强的那些讲稿。老朋友了解我又心疼我，只让我的演讲局限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例如曾永义先生让我在台湾大学讲历史题材的创作问题，黄光男先生让我在历史博物馆讲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问题，郑淑敏女士让我在中华电视公司讲老戏新编的问题，此外还有台湾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们要我讲的一些题目，都太专业、太具体了，没有必要去打扰更多的读者，决定全部都不收入本书之内。1992年初次来台湾时的三篇讲稿也带有一点专业性，却可反映出我初次来访时那种恭敬态度。那几篇讲稿多么拘谨，根本不敢稍离主题轻松地说一点什么，我想一切初来乍到的人都免不了如此的，现在彼此混熟了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前后对比，颇有意思。

编辑这本演讲集我不能不对每次演讲的组织者和广大听众表示感谢，你们其实是一半的创造者。每一个讲题是你们出的，每一次的场面是你们撑持起来的。前面我说到演讲者的艰难，其实心里明白，更艰难的倒是听众。完全不知道你会说些什么，甚至



还不知道你是否善于口头表达，操什么口音，居然早早地赶到会场安坐在那里等待冒险。我不习惯拿着讲稿上台，事实上也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演讲的内容完全是由台下听众的目光、表情、掌声、笑声一句句逼出来的，现在目光、表情早已远去，掌声、笑声也早已冷却，只剩下一堆寂寞的记录稿，很不公正地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忽然记起了一个情节。那天晚上到新竹科学园区演讲，演讲主持暗是我余姚的同乡、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清华大学的礼堂坐满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科学工作者，沈校长正在致辞，突然听到门外一片喧闹，原来有更多的听众还在外面。沈校长当即决定搬到一个更大的会堂里去，但这个时候，掌管钥匙的总务处长早已下班。数千名听众长久地站在校园里等待，天又下起了雨，我和听众们一起挤在湿淋淋的雨水中，轻轻地讲几句话，谁也不离开。我们在等什么？等钥匙，等开门，等一场灿烂灯光下的聚会，等一种夜雨淅沥中的沟通，至于由谁来引起聚会，由谁来执掌沟通，并不重要。

是的，重要的不是演讲，而是那把钥匙。有了那把钥匙，就能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更大空间里开始一种集体创造。

我只是集体创造的参与暗之一，提供一些文本，是希望勾起大家的记忆，把这样的集体创造继续进行下去。

1997年秋，上海—安徽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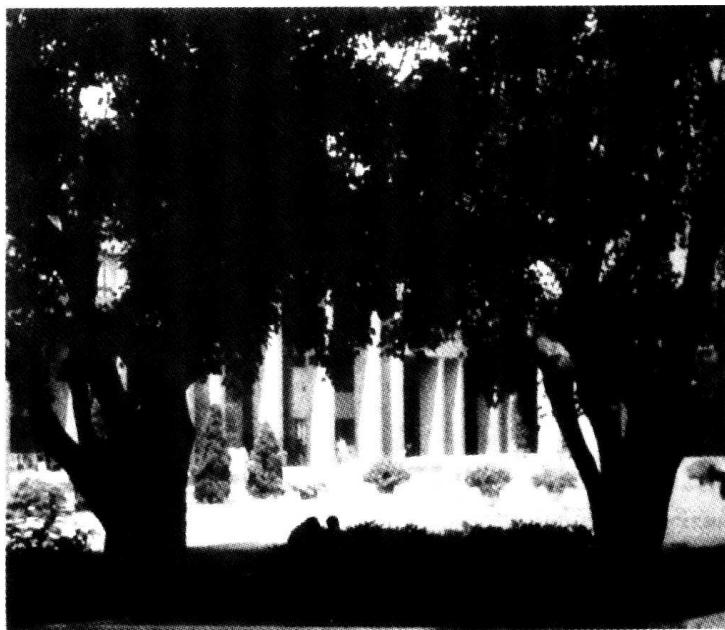


目 录

自 序	(1)
阅读建议	(1)
写作感受	(19)
寻找文化现场	(43)
行脚深深	(57)
无伤害原则	(69)
何处大宁静	(85)
转型期的文化态度	(107)
访求东方美学	(131)
两个世纪的痴迷	(149)
闯入傩的世界	(165)

附录

关于《余秋雨 台湾演讲》	(隐地) (183)
--------------------	------------



台湾省高雄市中山大学校园一角。

阅读建议

各位朋友：

中山大学我一定会来，原因之一是余光中先生在这里。我在《山居笔记》后记中曾经写到，自己的散文集在台湾出版，生怕有几个人看到，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与我同姓的先生。今天，居然由他来主持演讲会，演讲的题目又是读书，那我就更胆怯了，有谁敢当着余光中先生的面大谈读书？

但是报纸已经多次预告，今天又有不少其他城市的朋友远道



赶来，看来只能硬着头皮给大家提几点读书建议了，请余光中先生和在座诸位指正。

在中国话里，上学也叫读书。今天我们所谈的读书只指课外阅读。课外阅读当然是针对青年学生而言的，但我看到在座又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青年人的读书和成年人的读书在总体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需要分开来讨论。当然这种区分又不是绝对的，有些青年人在阅读上已经成年，有些成年人在阅读上还算青年。

青年人的阅读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点。我大概也能算作一个过来人，因此可以和同学们随便谈谈。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嗜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



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会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的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此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筛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不在乎名著，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籍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都为青年人开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能一辈子也读不完。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



硬凿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价著都读不下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各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二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嗜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